

《東華漢學》第 34 期；221-26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1 年 12 月

島嶼的離返：戰後張我軍的歸返敘事與北京再現

羅詩雲*

【摘要】

張我軍（1902-1955）從日治至戰後活躍於臺灣、中國兩地，其書寫呈現了殖民地青年的文化視域與中國觀察。終戰後他不僅積極參與臺灣省旅平同鄉會，1946年更返臺就職臺灣省教育會。戰後張我軍的書寫類別分為時論和散文隨筆，前者為關於政府政策的論述，後者為描繪臺灣風物的遊記、散文，內容穿插中國經驗參照，包含對臺灣現狀的失落與北京舊時生活的回味。張我軍的戰後文本可謂解讀戰時中國、戰後臺灣與離散臺灣知識分子狀況的重要參考。由生命經歷、文本題材、創作時點等角度，皆顯示張我軍書寫之於跨越1945年臺人生命史的考察意義。論述架構上，首先以終戰後張我軍臺灣同鄉會活動為軸線，進行中國經驗與戰後時論之研討，呈現戰後初期作家置身中國的活動狀況與文化思考；再者，爬梳張我軍對戰後臺灣社會樣態的觀察書寫，尤其是空間移動和記憶再現的感知互涉。本文由張我軍戰後書寫的考察，析論其歸返

*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部助理教授

前後所建構的臺灣圖景與記憶、認同之關係，掌握跨域臺灣知識分子的敘事模式與精神樣貌。

關鍵詞：張我軍、戰後臺灣、北京、離散、移動

一、前言：張我軍與中國

張我軍（1902-1955）一生與中國的淵源頗深，1921年赴廈門協助新高銀行支店的設立，並在同文書院學習漢文，受五四新文化運動薰陶。1923年7月銀行結束營業，張我軍12月轉赴上海參加臺灣留學生組織的「上海臺灣青年會」，出席1924年1月12日召開的「上海臺灣人大會」，嚴厲譴責治警事件檢舉之弊，並任執行委員。¹同年3月至北京投靠友人張鐘鈴而認識洪炎秋，並同於北京師範大學夜間部補習班就讀，²期間寫了數首新詩、評論投稿《臺灣民報》，同年十月返臺。1925年元月擔任《臺灣民報》編輯，系列介紹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並從事翻譯與社會運動。1926年6月再赴中國，9月完稿以北京為背景的小說處女作〈買彩票〉，考入北京的中國大學國學系，1927年插班轉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於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大學教授日文，且從事翻譯。旅京期間，張我軍與蘇蕙雨、洪炎秋、宋斐如共辦《少年臺灣》。1942、1943年赴日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島崎藤村、武者小路

¹ 王詩琅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頁 126-127。

² 楊菁，〈張我軍在中國〉，收入林慶彰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在中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4），頁 89。北伐後的中國以南京為首都，北京改名為北平特別市。1937 年中日戰爭後，北平被日軍佔領，改名為北京。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同年恢復原名北平。1949 年 1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市，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同年 9 月北平市改稱北京市。北京是一座三千多年歷史的古都，「北京」和「北平」在地理位置上是指同一座城市，因為時代政權的不同而有名稱上的差異，「京」字的使用是因為首都所在地之意。北伐後的中國以南京為首都，北京改名為北平特別市。本文考量研究對象對此地文化首善之想像，且旅居臺人的地域生活是以北京城牆內外空間作為界線（北京城牆、城門於 1949 年後陸續拆除，故本文研究對象屬於北京城時代的居民，生活或體驗世界的方式仍被北京城空間所影響），且研究角度涉及了城市歷史與現實所形成的連動影響，故本文論述行文仍使用「北京」一詞指稱，若為原典引文或指涉戰後《新臺灣》社群則依原文用語為準。

實篤等作家見面。1945年參加旅平同鄉會工作，協助臺人遣返事宜。1946年6月張我軍返臺，陸續任職於臺灣省教育會編纂組、茶葉商業同業公會、合作金庫業務部、研究室等單位，編有《臺灣茶葉》、《合作界》月刊。³

日治時期臺人赴北京的原因，包括工作、求學、文化認同、同鄉友人援引等，張我軍旅居中國的動機則是文化啟蒙與反殖民意識所使然。⁴ 1924年1月赴北京的張我軍，先前雖到過廈門、上海等地生活，但旅居北京的活動最為活躍，堪稱留學北京的第一代學生，是臺灣人從事文化運動的主力。⁵除1924年10月返臺至1926年6月辭去《臺灣民報》編輯職務，再赴北京，張我軍中國旅居時間近二十多年，此間不僅參與留學生社會運動、提出文學理論，且從事雜誌編輯、文藝創作、翻譯、評論。張深切曾以「雖然不能說是臺灣新文學的首創人，卻可以說是最有力的

³ 張我軍生平活動，參照張光正編，〈張我軍年表〉，《張我軍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頁475-492；許俊雅編選，〈小傳〉、〈文學年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6張我軍》（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頁31-32、41-58。

⁴ 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一卷第1期（2008.4），頁43-49；〈南遊印象記〉記有張我軍初次渡航中國的回憶與旅居動機，參見張光正編，〈南遊印象記〉，《張我軍全集》，頁278-279：「自今五年前，我從基隆搭船到廈門，這是與海接近的第一次。自是，在廈門、鼓浪嶼輾轉過了兩年。這兩年之間，我受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不少。（中略）自從領略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之後，我就不想回到如在葫蘆底的故鄉了。後來再奔波各處，數年之間，不斷地與海相親。現在不得已在狹的籠內過狹窄的生活，還時時想乘長風破萬里浪，跳出臺灣，到海的彼方去！」張我軍以「葫蘆底的故鄉」（臺灣）對照「海的彼方」（中國）予以隱射當時臺灣的封閉與狹隘，凸顯對殖民地臺灣大眾啟蒙的問題思考。一九二〇年代初親炙中國文化與學運風潮的他，於是選擇離臺再赴中國尋求答案。

⁵ 留學北京的第一代學生之說法，參見楊菁，〈張我軍在中國〉，頁91；山口守將張我軍第二期的北京生活按時序分為四期：一、中國大學以及北京師範大學的求學生涯（1926-29）；二、大學畢業後的日語教師及翻譯家生涯（1929-1937）；三、日中全面開戰後，對日本占領軍各類文化活動的參與（1937-1945）；四、日本戰敗後，回歸臺灣前的生活（1945-1946）。參見山口守，〈北京時期的張我軍：被文化與政治夾擊的主體性〉，《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0期（2017.2），頁60-89。

開拓者之一」形容，認為其深受五四洗禮而認識新文學運動。⁶張我軍除了具有文學家、理論家身分，還是日治時期重要的翻譯及日語教育家，長期進行跨文化的知識生產與理論著述。

張我軍著作的出版狀況，重要者有1975年張光直主編的《張我軍詩文集》，收錄新詩、小說、散文、評論、譯作等；1993年秦賢次編《張我軍評論集》和2000、2003年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此版本附有年表及譯著書目；2011年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二冊。⁷張我軍研究可分為七項研究主軸：新舊文學論戰、《臺灣民報》編輯活動、文學文本評析、左翼思想、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參與、舊體詩考掘及日語教育、翻譯和中國活動等。⁸近年論著則多見張我軍文學思想的相關闡述，而有主題式的作家比較研究。⁹就本文所論之作家旅居時間和文化活動性質，張我軍的中國經驗和交遊網絡，完整連結了日治時期臺灣文化人在中國的行跡，並夾雜身為日籍臺灣人在身分位置上的兩難，呈現身分認同、中國想像與文化行旅的互動脈絡；然概覽前行研究則相對集中於張我軍的新文學運動論述、詩集《亂都之戀》與戰時北京的文化活動等範疇，較少探究戰後返臺的散文、時論和活動。¹⁰本文將參照張我軍著述生涯

⁶ 張深切，〈悼張我軍〉，許俊雅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6 張我軍》（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頁 121。

⁷ 張光直編，《張我軍詩文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9）；秦賢次編，《張我軍評論集》（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張我軍全集（補遺）》（臺北：台海出版社，2016）；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社科卷）（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

⁸ 張我軍研究之詳細篇章內容、目錄，參見許俊雅，〈點燃火把，期待黎明：張我軍及其研究概況〉、〈輯五 研究評論資料目錄〉，許俊雅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6 張我軍》，頁 67-82、291-332。

⁹ 王國安，〈「罵」出新典律——論張我軍與林耀德文學革新運動的話語操作及運作策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十一卷第 3 期（2017.9），頁 54-72；賴衍宏，〈張我軍與正岡子規〉，《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 36 期（2014.12），頁 427-452；王文仁，〈新舊變革與文學典律——張我軍與胡適的文學革命行動〉，《東吳中文學報》第 20 期（2010.11），頁 191-218。

¹⁰ 張我軍的前行研究，參照許俊雅編選，〈研究評論資料目錄〉，頁 291-332。當中〈作品評論篇目〉所列綜論、分論（詩、文集）之研究書目，文類研

的三階段（1926年以前、1926年6月定居北京至1937中日戰爭爆發、從1937到1945年），¹¹並依據著述性質略作調整，論述其戰後初期旅京至返臺後的散文、雜文與論述，輔以後人的回憶文字，觀察張我軍於戰後語境下中國體驗與文化認同的建構。

歷史敘事中，1945年是自由世界戰勝軍國主義的時點，對戰後臺灣而言則是脫離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後，短時間內居住境內的多元住民「國民化」（nationalization）的歷史階段。¹²然而這國民統合的過程卻在戰後初期即遭嚴重的挫敗與分裂；¹³本文主要以終戰後至一九五〇年代間為考察段限，析論日治時期即旅居中國的張我軍文學記述。首先，以終戰後張我軍臺灣同鄉會活動為軸線，呈現其戰後之初置身中國的活動狀況與文化思路；再者，爬梳戰後張我軍對臺灣社會樣態的觀察書寫，與返臺後其文本所呈現的北京身影。本文意藉張我軍歸返前後的論述與創作，尤其是空間移動和記憶再現間的感知互涉，闡釋終戰後具離散經驗臺人的原鄉圖景與記憶、認同之關係，從而掌握跨域臺灣知識分子的敘事模式與精神樣貌。

二、迎來終戰：以臺灣省旅平同鄉會與張我軍時論為考察

日治時期以來旅居北京的臺人概況，可由臺灣知識分子文化組織、同鄉會及其會館之脈絡分述。前者從1922年成立的「北京臺灣青年會」

究比例上張我軍文學論述與《亂都之戀》相關篇目明顯佔多數，其次為散文、小說〈買彩票〉。研究時間段限集中於二〇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論述，其次為1937年後作家的北京活動。

¹¹ 張泉，〈張我軍日文譯作的時代及意義〉，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上）》（社科卷）（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頁4-8。

¹²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17。

¹³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192。

論起，此組織以中國文化研究與倡導臺人赴京留學為宗旨。主要成員為北京大學臺人學生，聚會於王悅之崇文門釣餌胡同的居所。此團體與文化協會保持聯繫，支持臺灣民族主義啟蒙運動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¹⁴1923年發表的〈華北臺灣人大會宣言〉由「臺灣遺民」的角度闡述民族、政治、軍閥、資本之於臺灣的壓迫，連帶起與二〇年代中國的共同境遇。「遺民」本身暗示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意義建立在合法性及主體性逐漸消逝的邊緣上，就臺灣人而言就是1895年的時間裂變；¹⁵此組織由1927年張我軍等人重組的北京臺灣青年會接續，發行《少年臺灣》月刊，嘗試建立臺灣與中國之間思想知識的資訊橋樑。¹⁶

北京臺灣會館的相關狀況，由於臺人身分敏感與會館產權不明，致使臺人經常選擇福建、廣東籍貫，避免當地人歧視或行事紛擾。張我軍西渡廈門時就將籍貫填為漳州，北京就學、任教時則將籍貫分別填為福建廈門、福建南靖。旅居北京的張深切亦曾冒稱中國籍，戰後文章記有對外謊報中國籍民的記事。¹⁷民國時期北京臺人經常出入閩籍會館，晉江會館、龍溪會館與泉州會館都是北京臺灣人的據點。¹⁸二〇年代張我軍留學北京即入住孫公園附近的泉郡會館，其他如張鍾鈴、洪炎秋等人亦是。同鄉會至1937年後方收回北京大江胡同的臺灣會館自管，自此

¹⁴ 王詩琅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 164-167。

¹⁵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34。

¹⁶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頁 134；洪炎秋，〈楊肇嘉回憶錄序〉，陳萬益編，《閑話與常談：洪炎秋文選》（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245。

¹⁷ 黃乃江，〈張我軍的處女作及其在廈門之文學活動新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二卷第 3 期（2008.5），頁 11；張我軍籍貫資料參見《畢業同學錄》（北平：國立北平師範大學，1929）、《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教員錄》（1939.11）、《國立北京大學工學院教員錄》（1939.12），山口守，〈北京時期的張我軍：被文化與政治夾擊的主體性〉，頁 98、101；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2 里程碑》（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頁 716-717；張深切，〈殺犬記〉，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3 我與我的思想》（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頁 241。

¹⁸ 葉芸芸，〈一個局外人的故事〉，《餘生猶懷一寸心》（臺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174。

便有臺人入住大蔣家胡同的臺灣會館紀錄，例如1941年赴北京發展的鍾理和。¹⁹1945年後臺灣會館成為旅平臺灣同鄉會與旅京臺人組織的活動據點。由臺灣同鄉會的紀錄，可知1937年前後謝廉清、林煥文、林少英、張深切、洪炎秋、梁永祿等人陸續出任同鄉會會長，²⁰梁永祿的三安醫院為終戰後華北返鄉臺人的暫住地。戰時北京臺人文化活動雖活躍，同鄉會活動卻因戰時體制與臺籍身分之故相對消沉。張深切描述戰時的旅京臺人並不願參加同鄉會，原因是拒絕淪為被日本殖民當局動員的御用人士。²¹

戰後北京臺人以同鄉會為據點，陸續成立臺灣省旅平同鄉會（1945.9）、臺灣革新同志會（1945.10，會址南長街57號雲溪會館）、臺灣省旅平同學會（1946.4）等團體。張我軍擔任旅平同鄉會的服務隊隊長與執行委員，協助華北臺人返鄉與臺灣接收事宜。²²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機關誌《新臺灣》詳載了臺人活動之熱切與組織性。²³1945年9月9

¹⁹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北京：北京大學，2012），頁122-123。林海音，〈番薯人〉，《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臺北：格林文化，2000）：「母親曾對我談過，父親生前有志把北京的台灣會館收回。……民國十二年父親曾對收回台灣會館一事努力過，但無結果。父親死後，家中所存的一疊台灣會館資料，就被台灣同鄉賴先生兄弟取走，他們也想繼續努力，但無下文。」頁25-26。

²⁰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頁92、132-133。

²¹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2 里程碑》：「北京本有一個臺灣同鄉會，旅京同鄉都不喜歡參加，因為這裏的同鄉，大抵冒稱福建人或廣東人，自食其力，以託庇日本勢力占便宜為恥辱，這在全國可謂絕無僅有的特徵，日本當局認為這是要不得的嚴重問題，想要加強同鄉會，利用同鄉會做他們的御用機構。」頁657。

²² 秦賢次，〈張我軍的漂泊與鄉土〉，彭小妍主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1996），頁13。作為旅平同鄉會重要任務之華北臺人返鄉事宜進行得並不順利，除了戰後接收復員、交通、經費問題，還有國共內戰的阻礙，故當局設法先將平津臺胞分批抵滬，再行遣送臺灣。褚靜濤，〈臺灣光復後滯外臺灣同胞返臺的經過及其影響〉，《臺灣研究》第1期（2000.3），頁83。

²³ 編輯部，〈台灣省旅平同鄉會成立〉，《新臺灣》創刊號（1946.2.15）：「旅平台灣人士因此次我國抗戰勝利，得以脫離日人羈絆，無不歡欣雀躍，已於日前致電 蔣主席致敬，並於九月九日下午二時在西單大光明戲院開

日「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召開成立大會，選出執行委員七名與監察委員二名。²⁴同鄉會及其機關誌《新臺灣》任務包含介紹本省實情、救濟同鄉、舉行懇談會等事務。²⁵1926年即已存在的臺灣旅平同鄉會，至1945年終戰後組織活動才開始活躍，旅京臺人紛紛思考參與政治事務的可能，並積極爭取臺人權益與身分正名。²⁶

戰後旅京臺人最重要的課題，為解決國民政府戰後對臺人態度與政策的誤解及失察，主要問題有三：一為國民政府核定的「關於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二為1945年9月1日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警備總部之特殊機關；三為對臺人國籍問題的延宕處理。此外，國民政府以漢奸嫌疑罪名逮捕部份旅京臺人，如江文也、柯政和、謝廉清、彭華英、林文龍等人。²⁷基於上述狀況，臺灣省旅平同鄉會與天津市臺灣同鄉會合併為「臺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加強會務進行，為維護臺人權益、支援臺灣國語運動、協調安排華北臺人回鄉等事宜奔走。聯

全體大會，出席者共有五百多名，討論百出，情緒熱烈，其盛況洵謂近年來未有見之……。」頁8。

²⁴ 執行委員七名：梁永祿、洪炎秋、林朝榮、張我軍、張深切、吳敦禮、洪耀勳；監察委員二名：陳天錫、蘇子蘅。《新臺灣》雜誌介紹，參見秦賢次，〈《新台灣》導言〉，《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2《新臺灣》》（臺北：傳文文化復刻出版，1998），頁5-7。1945年9月11日舉行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議決委員之職務：會長洪炎秋、事務委員洪耀勳、文書委員張我軍、聯絡委員張深切、調查委員吳敦禮、學務委員林朝榮、宣傳委員梁永祿，同鄉會辦事處設立在西城南太常寺4號。

²⁵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頁143-144。

²⁶ 何標，〈從《鄉音》回溯《新臺灣》〉，《明月多應在故鄉》（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據現有資料，『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在1926年即已存在。」頁275。由《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機關誌《新臺灣》篇章論述，可知戰後初期臺灣人對邊緣他者的身分自覺，以及主體性追求的強烈企盼。參見羅詩雲，〈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淡江中文學報》第41期（2019.12），頁215-242。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活動分為三階段：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組織臺人建設戰後臺灣；1946年5月至1947年底，旅京臺人投身民主運動；1948年以後的北京。參見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頁149。

²⁷ 國民政府至1946年1月12日才公佈臺灣人國籍恢復為中華民國籍的行政命令。臺人漢奸爭議問題，參見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頁56-58。

合會運作下成立了五個社團：臺灣革命同難同志會、臺灣省教育協進會、臺灣革新同志會、新臺灣建設協進會、臺灣省旅平醫師聯絡會。張我軍曾向北平市政府陳報臺灣省教育協進會成立公文，卻未獲批准。上述社團獲政府許可正式運作者唯臺灣革新同志會（1945年10月14日成立），會務是協助文教人員訓練、赴臺從事國語語文教育，張深切、洪炎秋、林少英都是該會同仁。²⁸

終戰後活躍的同鄉會甚至出現張我軍與鍾理和兩世代對國族觀念的內部論爭，如張我軍在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成立大會前幾日發表的〈臺灣人的國家觀念——臺灣光復後的問題之一〉：

近日似乎有人在擔心臺灣人的國家觀念的問題，意思是臺灣人受過五十年日本式教育，他們觀念上的國家恐怕已經是日本而非中國，尤其二十幾歲的青年的國家觀念更是如此，要改造他們這種觀念大約是一件極費力的事。我想這確乎是最根本而且最切迫的問題，所以把它作為臺灣光復後諸問題的天字第一號來談一談。……然若就現狀而言，約略可以將臺灣人的國家觀念大別為三種：第一種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國家觀念，這種人所求的只是安居樂業，……第二種是身在臺灣而心在中國。他們愛護中國的熱情，比較國內的同胞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三種是相對地信奉日本是他們的國家，他們便是日本的臣民。大體說來，知識階級大多數屬於第二種人，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一大半屬於第三種人，其餘屬於第一種人。²⁹

在張我軍的分類中二、三十歲臺灣青年大多為日本認同者，且於文章提出教育能矯正青年的國家觀念。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特別強調國府派往臺灣的接收人員，必須慎重選擇，或許是回應1945年9月1日臺灣省行政

²⁸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頁147。

²⁹ 張我軍，〈臺灣人的國家觀念——臺灣光復後的問題之一〉，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 上》（社科卷），頁277-279。（原載《華北新報》1945年9月3、5日）

長官公署與臺灣警備總部的成立。且此文論點不僅是指陳臺灣年輕世代的日本認同問題，背後更幽微的是摻雜張我軍對自己戰時文化活動的自白與表態，³⁰或可視為其謀求擺脫漢奸嫌疑，而藉由國語推行運動自清並回臺發展的策略。

另一方面，張我軍〈臺灣人的國家觀念——臺灣光復後的問題之一〉的說法引起人在北京、時值三十歲的鍾理和與同輩青年之不滿：「大部分的青年則因對於張我軍——即張四光的一篇「論台灣人的國家觀念」一文中太過蔑視了青年的存在——據說那是太過侮辱了青年而激起忿懣與糾紛。」³¹戰後被歸為二等國民的不公待遇、切感青年活動重要性的鍾理和特別著文〈為臺灣青年伸冤〉反駁張我軍，為臺灣青年辯護沒有國家觀念的誤解，³²並於日記表示對同鄉會委員選舉結果的不滿：「選舉會長一（三安醫院梁永祿），委員六，監察委員二。兩個「時代」的鬥爭，青年與老輩的鬥爭。……老輩不曾認識青年的力量而忽視青年的存在，此是他們的失敗。」³³鍾理和、張我軍二人的爭論另表現旅平同鄉會內部成員的世代組構，以及對臺人認同狀況的認知差異。

1945年9月張我軍密集以「臺灣光復後的問題」為思考，於《華北新報》、《新臺灣》發表時論，包括〈臺灣人的國家觀念〉（1945.9.3、9.5）、〈臺灣的宣撫工作〉（1945.9.7）、〈新臺灣的教育問題〉（1945.9.13、9.15）、〈臺灣省國語國文普及管見〉（1945.9.22、9.25）、〈關於臺

³⁰ 北京時期張我軍活動存在著參與電影《東洋和平之路》（1938）、擔任「偽北大」教授、出席 1942、43 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爭議。在中日戰爭背景、國際情勢與殖民地臺灣出身的綜合考量下，張我軍掩藏真實身分以張迷生之名參與電影《東洋和平之路》。山口守指出終戰後旅居北京的部分臺灣青年對戰時張我軍的行為有所排斥，可見於鍾理和北京日記所記錄的 1945 年旅平臺灣同鄉會結成典禮，會中青年嚴厲批判張我軍在戰爭時期的對日合作態度。參見山口守，〈北京時期的張我軍：被文化與政治夾擊的主體性〉，頁 70-78。

³¹ 鍾理和，〈鍾理和日記〉，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卷六，頁 42。（1945 年 10 月 29 日）

³²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54-56。

³³ 鍾理和，〈鍾理和日記〉，頁 7-8。（1945 年 9 月 9 日）

灣省中小學教科書〉(1945.9.30)、〈為臺灣人提出一個抗議〉(1946.2.15)等篇章，足見他對臺灣戰後復員的關懷，尤其是臺灣國語文教育方面的施行意見。〈臺灣的宣撫工作〉強調對臺「撫恤民疾」原則，中央不應以歧視眼光看待臺灣為殖民地。根據9月4日國民政府檢發的〈台灣省收復計劃大綱〉，³⁴已備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警備總部的部署，並派員以飛機發散傳單、接收廣播電台、擴大軍容實力等方式宣傳臺灣人民的幸福前途。大綱並註明一律解除日本官吏職務，以國內人員接替，人力不敷時以臺人遞補並訓練，各機關酌設通譯人員。張我軍〈臺灣的宣撫工作〉也提出與收復大綱事項的相似內容：任用具國語文能力的臺灣人和閩南人、軍隊陣容的注重等；戰後初期張我軍延續他日治時期對教育議題的關注，就接收新臺灣的教育問題設想諸多辦法，如前述之〈新臺灣的教育問題〉：

希望國內同胞與台胞共同努力，以學校教育為中心，在台灣全省推行國文普及及國語。尤其希望華北的同胞特別幫忙。……我全國同胞對於台灣的各種問題，均有關心的權利和義務，特別是北平乃我國文化城，對於教育的問題，不乏專家學者，甚望群起而研究討論之。³⁵

考量臺人的戰後願景與期待，作家進一步於〈臺灣省國語國文普及管見〉、〈關於臺灣省中小學教科書〉分由國文復興和國語新興兩方面運動論起，具體提出講習會、廣播、留聲片、教科書等國語文普及的推動方法，態度理想樂觀。張我軍還指出臺灣的教育施行可分為急進與暫進

³⁴ 檔號：0034/002.6/4010.2/1/006，案由：〈派該長官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檢發收復計劃大綱一份〉，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https://art.archives.gov.tw/FilePublish.aspx?FileID=750>。資料參照楊護源，〈附錄：戰後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備準備相關大事記〉、〈終戰後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備準備(1945.8.15-10.31)〉，《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第37期(2014.12)，頁13。

³⁵ 張我軍，〈新臺灣的教育問題〉，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 上》(社科卷)，頁290。(原載《華北新報》1945年9月13、15日)

兩類：前者是停授一切學科，全部教授國語文，但此法效果與可行性大有疑問；後者構想則值得一試：

（一）教學用語除國語國文以外暫用臺灣方言。（二）學科須依據教部所規定的標準，國語國文程度可酌量降低，但在畢業以前最好能趕到規定的標準。（三）教科書用臨時教科書，由臺灣省聘請專家編印；所用文字除國語國文以外，均用日文。這就是折衷的，暫進的辦法。……現在為便於過渡期的教學，利用日文於臨時教科書，似乎並沒有不可以的。我們不應由於感情作用，雖有利用價值的東西也棄之不利用。³⁶

張我軍在教材表記主張折衷使用日文，且有鑑於中國各地同樣國語尚未普及，也是用當地方言教學，而提出教學用語可運用臺灣方言為輔助。然張我軍認為臺灣方言因為與國語文相差太甚而無法互通，最終仍如〈臺灣省國語國文普及管見〉所論國語文學習最終是不以方言為媒介的。

文化重建工作是國府接收臺灣的迫切課題之一，尤其政府視國語學習為形塑國族意識的重點，故教育部指派了魏建功、何容等人於1945年11月來臺，並籌設「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各縣市的「國語推行所」，洪炎秋即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之一。³⁷在戰後的國語學習熱潮中，加諸文化環境、戰後失業教員、臺人遣返等背景，華北人士的協力成了張我軍論述國語教育的特殊論點：「華北地區和東三省的日語教員，……這些教員，經一番選擇再加以短期的訓練之後，很可以去當國語國文的教員。」³⁸除了任用教員的國語文能力關乎國語普及成果外，張我軍認為學歷人格的內在素質亦是要件，從而可知作家對華北臺人學

³⁶ 同前註，頁 287-289。

³⁷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12），頁 235-236、245-250。值得注意的是，魏建功和何容曾倡導以方言學國語及注音符號的論調，以促進國語的標準化。這樣的看法與張我軍〈新臺灣的教育問題〉論述中暫用臺灣方言為教學用語的過渡方式意見，有所類同。

³⁸ 張我軍，〈臺灣省國語國文普及管見〉，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 上》（社科卷），頁 294-295。（原載《華北新報》1945年9月22、23日）

養品格的信心。系列時論之外，1947年張我軍身體力行編纂國語教材《國文自修講座》，將目標放在「一個國民所應有的最低限度的國文能力」，運用日文撰寫前六卷內容，七至十二卷則嘗試以國語文講解。

然張我軍終戰後國語教材編纂的表記概念與教學想像，實延續戰前對臺灣語言有限的思考脈絡，如《國文自修講座》導言所述：

假如臺灣方言是能夠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來表現的話，那麼用它來做工具，可以說是最理想的了。無奈臺灣方言是無法表記的，即使勉強用漢字寫出來，讀起來比國文也許更難懂。所以本講座只好藉用大多數臺胞能懂的日文做工具。³⁹

張我軍解釋臺灣方言雖是最理想的講授文字，但無法表記，故援用當時多數臺人共通語言日文為過渡工具，待學員有一定程度後即使用國語文表記的教材學習。此編寫構想，前行背景可追溯至戰後作家時論〈新臺灣的教育問題〉考量臺灣民情，建議過渡期教科書暫用日文為表記工具的彈性作法。又，考量張我軍《國文自修講座》卷一序言，感嘆戰前自己在臺提倡的白話文和新文學，經二十年光陰之後已消失殆盡的遺憾。⁴⁰加以對比戰前、戰後張我軍對臺灣語言表記的論述，可以發現戰後他對臺灣本土語言甚或文化發展的認識並未有太大改變。⁴¹時隔二十年返鄉

³⁹ 張我軍，〈《國文自修講座》卷一導言〉，《張我軍全集》，頁402-404。

⁴⁰ 張我軍，〈《國文自修講座》卷一序〉：「那時年少氣盛的我，也學著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居然在台灣投下了文學革命的一彈，提倡了白話文和新文學。……直到前年台灣光復，去年我才重踏久遠的故土。計算起來，二十年的時間早已過去；而我當年留在台灣的兩顆無力的種子，不但未曾長根發芽，連種子本身都被埋到地層裡去，無影無踪了！」見同前註，頁400

⁴¹ 論者指出戰前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試圖以胡適的白話文學建設論評估臺灣語言改造的可能，展開臺灣話的書寫語表記之討論。張我軍的主張並非是廢去漢文，而是要用臺灣話改良過的漢文（即白話文）取代過時的傳統漢文，非限以北京話做為書寫文字。如張我軍1926年出版的《中國國語文作法》導言說明「白話文」又可稱做「國語文」，若用羅馬字寫臺灣話也能叫做白話文，漢字寫臺灣話也未嘗不可稱做白話文。而他推行臺灣語音的白話文，又輕侮臺灣話的原因，乃源於發聲的知識位階、中國文

的張我軍感於時勢所趨，更基於對戰後臺灣文化的迫切改造、旅中臺人的發聲位階和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等諸多因素，促使他未能通盤思考臺灣方言對國語文表記學習的在臺脈絡與適用性。

由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旋即於1945年9月召開成立大會，促進中國、臺灣兩地文化交流、協助臺人遣返、教育與國語運動推進等事務，並以機關誌、社會輿論提出問題、反映立場，顯現了臺人組織規模與聯絡網之緊密，一時之間頗具社會影響力。⁴²面對終戰，張我軍擁有強烈的使命感、敏銳的現實感，延續一九二〇年代以來語文改革和戰時教育事業的運動理念，因應時局政策展開臺灣國語文運動的系列論述，更付諸行動編纂教科書。綜上所述，透過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活動、華北臺人的組織聯繫、張我軍、鍾理和的世代論爭，以及對推行臺灣國語文教育的意見論述等，縱然其文化論述與現實存有隔閡，仍深刻展現了華北臺人群體積極爭取言論空間、確立主體身分，與張我軍自詡為溝通戰後中國、臺灣兩地橋樑的責任感及自信。

三、身分與記憶的交涉重構：戰後張我軍的歸返書寫

北京離散與戰後臺灣生活形成張我軍的兩股經驗引力，激發不同的思維與視野。除了旅京期間的新詩、小說、散文，張我軍返臺後的創作常留有北京殘影，顯現空間地域的距離並未讓他遺忘北京，反而為其回望北京提供另一種創造性可能。作家戰後對北京記憶和情感的引述，表

化中心的濃厚色彩且過於理想樂觀的態度，而忽視了臺灣話語的本土性、主體性以及殖民情境的特殊性。戰前張我軍對臺灣本土語言的論述侷限，參見劉恆興，〈兩端之間——論 1920 年代張我軍新舊文學意識與文化民族認同〉，《漢學研究》第二十七卷第 2 期（2009.6），頁 351-358；王文仁，〈新舊變革與文學典律——張我軍與胡適的文學革命行動〉，頁 206-208；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導言）〉，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補遺）》（臺北：台海出版社，2016），頁 38。

⁴² 羅詩雲，〈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頁 221-222。

現了主體對北京的心理依附及北京所提供的認同情境。本節將由作家戰後散文中的歸返敘事與北京經驗論起，呈現張我軍如何建構認同的場址——臺灣：

（一）戰後的作家歸返與遊歷記述

1、作家的遣返與願景

1945年9月張我軍即參加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運作，擔任服務隊隊長與執行委員，協助華北臺人返鄉與臺灣接收事宜。⁴³但是臺人遣返臺灣過程並不順利，根據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的公文顯示，從1945年9月以協助華北臺人返鄉為要務的旅平同鄉會成立，至翌年3月一千七百多名滯留臺人始得陸續返臺。⁴⁴相較於救濟總署的協助，國民政府態度倍顯消極，故平津臺人表露對中國政府的不滿：

承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好意第一批還台平津同胞四十名在三月上旬由塘沽經上海，歸還到台灣了。三月十九日該署又通知台灣同

⁴³ 秦賢次，〈張我軍的漂泊與鄉土〉，頁 13。

⁴⁴ 關於旅平同鄉會對臺人遣返問題的協助，參見洪炎秋，〈我的朋友吳三連〉，《淺人淺言》（臺北：三民書局，1971），頁 31：「因為我們各級政府，正在忙於接收，急於復員，物資入手，兩感不足，海運工具，完全缺乏，空運自然也是力不從心。三連兄和我，感到十分頭痛，於是鳩首討論，窮人想出窮辦法來，決分四方面進行：①向比較富有的同鄉募捐；②向十一戰區、北平行營、日俘管理處交涉，對被徵軍屬，按口給予日俘的口糧，並設法籌畫船隻，把他們送回；③向救濟總署天津分署請求其對於平民身分的臺胞，儘可能予以救濟，並代洽遣送船隻；④向天津港口司令部交涉，遇有遣送臺胞回臺船隻，在手續上儘量給予方便。」旅平同鄉會成員張我軍亦擔任其中一個服務隊的隊長，協助臺人返臺事宜。秦賢次，〈張我軍的漂泊與鄉土〉，頁 13；關於戰後首批平津臺人返臺波折與輿論，參見〈台灣同胞之回籍〉，《新臺灣》第 1 期第 2 卷（1946.2.28），頁 1；〈航政局拒絕臺灣同胞回籍〉（轉載北平新報），《新臺灣》第 1 期第 2 卷，頁 5；〈台灣消息評述〉，《新臺灣》第 1 期第 2 卷，頁 6-7；臺灣重建協會，〈為臺灣同胞講幾句話〉，《新臺灣》第 1 期第 2 卷，頁 10-13；返臺人數與狀況，參見王蘊漢（撰稿人），〈為呈報遣送臺灣難胞回籍情形請鑒核備查由〉（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公文稿），陳雲林總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第 102 冊，頁 370-371。

鄉會擬於卅一日再遣送第二批二六〇名。因該署向來辦事很有信用，同鄉會隨時通知會員立刻處理起程準備。……管吃，管住，還管零錢，還能逛趟上海。可是每一個台胞的心裏免不了發生一種疑問——為甚麼我國政府不能送回我們，非得靠外國人的力量不可？——其實當局或台灣當局並非沒有船，而外國人說行，就是行，不會答應後，忽然變更其態度的。⁴⁵

林獻堂等民間人士亦為海外臺人遣返奔走請願，但仍須藉助官方幫忙。行政長官公署也思考展開旅外臺人的遣返救濟，不過考量社會治安和國際觀點以遣送日俘為先，態度並不積極。⁴⁶

協助臺人返鄉事宜告一段落的張我軍，1946年3月為生計轉赴上海與人合作經商，後於1946年盛夏返臺。對照1946年3月以來上海的臺人遣返船班，以及7月任臺灣省教育會編纂組主任的作家經歷，張我軍應為5月至6月間返鄉，⁴⁷至1955年作家病逝前在臺灣故土度過九年時光。對於中日戰爭勝利後隨之而來的臺灣復員，張我軍曾道出無比興奮的雀躍心情：

臺灣的光復，精神方面對於臺灣同胞的影響，不消說是大極了。尤其像我這樣，離開臺灣時就決心不做歸計的人，更是感奮無以復加！光復消息一傳出，我立刻就改變方針，決計回到臺灣，由衷心願將後半世餘生貢獻出來，為國家效勞，為桑梓服務。因為臺灣能夠光復，我一生之願已償，尚復何求呢？（〈《國文自修講座》卷一序〉，頁400-401）

深感殖民地臺灣文化空間受限的張我軍，一九二〇年代決心離鄉遠赴中國求學發展理想。而中國的勝利等同一圓他畢生期盼臺灣民族解放的宿願，故戰後決定為返鄉臺人和新國家服務，1945年更加入旅平同鄉會協

⁴⁵ 〈台灣消息〉，《新臺灣》第1期第3卷（1946.4.1），頁9。

⁴⁶ 何鳳嬌，〈戰後接運旅外台胞返籍初探〉，《臺灣風物》第五十卷第2期（2000.6），頁180-182。

⁴⁷ 張我軍，〈《國文自修講座》卷一序〉，頁401。張光正編，〈張我軍年表〉，頁490。陳雲林總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第102冊，頁370-371。

助臺人遣返事宜。同鄉會機關誌《新臺灣》的內容涵蓋會務報導、平津臺人動態、臺灣歷史與現況、文學創作及臺灣普及國語運動的推動，為當時旅居中國的臺人言論代表，張我軍也多有投稿刊文。

除了協助華北臺人返鄉，張我軍深感於戰後臺灣人不諳國語的苦悶，1946年出任臺灣省教育會編纂組主任，繼而開設書店投入國語自修讀本《國文自修講座》的出版，協助培育國民的國語文能力：

去年盛夏回到臺灣以來，碌碌過了半年，始終找不到一個工作的頭緒；直到最近才發見了一件最關緊要而又無人著手的工作，就是國文自修書的編著刊行。這也是佛家所謂的「因緣」，二十餘年前在臺灣出版了《中國國語文做法》的我，現在又在這裡寫《國文自修講座》；事如昨今，竟同隔世，不勝感奮之至！〈《國文自修講座》卷一序〉，頁401)

張我軍另強調此作是為使讀者以自修的方法獲得國民的基礎國文實力，可見他對作為新中國的「國民」具有深刻體認，並迫切建立臺灣人與國民身分的正當連結或能力條件。戰後初期張我軍亦積極與臺中文化界人士莊垂勝、葉榮鐘接觸，與地方仕紳張煥圭集資擬辦《中報》，重振日治時期在臺灣的文化工作。1946年年底終籌辦《聯合月刊》，雖已印刷卻因二二八事件而未能出版。⁴⁸戰後初期回臺的張我軍境遇雖不順遂，但仍努力臺灣人的文化教育事業，與日治時期臺灣、戰時北京的文化實踐頗有精神承續之處。

另一方面，作家面對中國接管之下的時局政策亦表達過不滿，他以筆名伍君發表〈為臺灣人提出一個抗議〉（1946.1.15）於《新臺灣》，抨擊1945年11月國民政府所核定的「關於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

他們意識著自己是中國人，信仰著祖國的政府，渴望回到祖國懷抱，藉以擺脫那繼母般的日本政府的毒手，……旅居各省市的台胞，至少平津兩地的台胞，都是日日過著危懼不安的生活，這是

⁴⁸ 葉芸芸，〈試論戰後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及其文學活動〉，《餘生猶懷一寸心》，頁51-52。

千真萬確的事實……台胞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掙扎了五十年，唯一的期望是重返祖國懷抱做個清白的國民。⁴⁹

內容分為五節的〈為臺灣人提出一個抗議〉，論述步驟先從臺灣人民族立場的自清起筆，再切入「關於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對臺人民族意識親日假設之不公，接續申述此辦法連帶影響政府的臺灣接收及中國人民對臺人之態度。其發言不僅是站在臺灣人一方看待問題，更設身處地以政府立場提出見解，低姿態勸說當局的政策施行；在戰後中國、臺灣兩地交通運輸和臺人身分證明問題皆未解決的處境下，此產業處理辦法無疑是雪上加霜損害旅中臺人的權益及祖國認同，更對中國政府與臺人之間的關係造成隔閡。此篇政論亦呈現出臺灣人在戰後中國的身分掙扎，內心的中國認同與外在的國人眼光難以契合之困境。此外，顯現了日治時期以來張我軍身分認同的中國傾向，表明臺灣人對中國的民族情感與為國貢獻的返鄉服務心志，展現建構文化身分、國族認同的能動性；關於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之於旅居中國的臺人衝擊，鍾理和〈祖國歸來〉（1947年未完稿）同樣批判政府此法對旅京臺人的不平待遇：

政府通過一月十四日的報紙，頒布了「關於朝鮮人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這辦法，無論如何，是令人十分費解的。但，它已夠使台胞感到惶惑、驚駭，並且焦急的了。（中略）幸而此辦法在我所知範圍之內，似未付諸實行。不然，施行之日，它如能發揮效果的話，當不在其成就，而將在破壞那一面。它將使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台胞，第一步便感到幻滅與痛苦。後來政府雖然將此項法令撤銷，但它留給人們的，將係一個不痛快的回憶。此外，無疑的還要對政府辦事馬虎，朝令暮改的態度，刻下不良的印象的。這又是政府的失敗。⁵⁰

⁴⁹ 伍君，〈為臺灣人提出一個抗議〉，《新臺灣》創刊號（1946.1.15），頁7-8。

⁵⁰ 鍾理和，〈祖國歸來〉，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卷五，頁272-275。

張我軍、鍾理和雖對臺人國家觀念狀況持以不同想法，卻一樣認為甫回歸祖國的臺灣，戰後即面臨了政策與環境皆產生極大變化的轉折。兩人言論顯現旅中臺人全體因地緣關係直接遭此衝擊，進而產生對新政府的質疑與批判。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困窘的環境或其威脅會造成主體的焦慮，但它也助於建立適應性的反應核心的創新精神。⁵¹因此，情緒上倍感焦慮的旅居中國的張我軍，時常在著作文字中強調堅定的民族意識，以明己志、驗明國民正身。1947年11月張我軍為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所寫的序文，就提及旅居北京期間自己與張深切對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的反對立場。張我軍透過序文不僅評述張深切《史略》一書優劣，更感於臺灣戰後的時空讓此書得以面世，讓讀者一窺抵抗日本殖民的臺人思想犯之鐵窗生活，藉以重申旅中臺人堅定的民族立場與臺灣殖民地生活的痛楚。這種對政治立場的先行表述不僅見於張我軍的戰後文字，代表北京臺人言論機關的《新臺灣》也多有所見。

至於1946年5月至6月間作家渡海返臺的相關經歷，張我軍並未留有直接記述，然仍可由張我軍友人孫裕光之女孫康宜的回憶側知其艱辛過程，包括船票的搶購、搭船時運梯鋪設的簡陋、船艙的破舊、生活用具的髒污不堪等：

據說當時的船票很難買到，要排很多天隊才能勉強拿到票，即使能買到票，由於所有船艙都是人擠得滿滿的，我們一家大小是否能安全地上船還真成問題。特別是，要上船之前，人人還必須冒著生命的危險爬上一個又高又窄的梯子，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海裡去。……船上的甲板似乎到處都很破舊，連母親蓋著的棉被也沾上了不少鐵鏽。⁵²

⁵¹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2），頁41。

⁵² 孫康宜，〈張我軍、張光直和我們家〉（附錄），收入何標（張光正），《明月多應在故鄉》，頁15-16。

孫裕光雖是天津人，但是同航者多為遣返的臺人，赴臺原因是不堪戰後初期北京通貨膨脹的壓力，決定來臺謀生解決經濟問題。從張我軍戰後散文也知其北京生活不易：「在北平生活的二十餘年間，我也數不清走了多少回當舖了，論理應該是司空見慣的，然而始終無法『見慣』。」（〈當舖頌〉，頁303）在當舖所忍受的不僅是典當物品價值的貶抑，還有舖伙對自己的上下打量，令人感到沉重的侮辱。此外，孫康宜的記述可知戰後初期不乏來臺依親的中國人士；鍾鐵民也曾回憶戰後1946年隨父母遣返渡航的過程，他與孫康宜同樣以孩童角度觀察，描繪船艙空間極度狹窄，海上生活令人十分不適的感受：

我們後來在1946年3月終於離開北平，乘船的經驗雖新鮮，卻並不十分愉快，寬廣的船艙裡燈光昏暗，所有的人就在地板上席地坐臥、除開空出來小小的通道外，全是坐著躺著擠滿了跟我們一樣要回故鄉的人和行李鋪蓋，擁擠濕悶，呼吸都難過。……只有我為了排解無聊不斷的上上下下，來回次數多了惹人討厭，特別是從甲板剛下來，黑漆漆的船艙裡一時看不見通道，不時踩進別人床位，也常踩到別人，結果處處挨罵。⁵³

從孫康宜、鍾鐵民等人的返臺記述，可推測和孫家同船遣返的張我軍狀況，和不畏艱險渡航返鄉的現實考量。張我軍選擇離開生活二十多年的北京返臺，除了情感上的思鄉心情，也有推行國民國語文運動以及現實生計的因素：「在北平過了半輩子紙墨和粉筆生涯的我，回到光復了的臺灣來，竟會為了餬口之計走進素昧平生的茶葉界做事。」⁵⁴然也因如

⁵³ 鍾鐵民，〈北平的記憶〉，《鹽分地帶文學》第19期（2008.12），頁30。

⁵⁴ 張我軍，〈關西鎮上看摘茶〉，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補遺）》（臺北：台海出版社，2016），頁18。張我軍寄林海音的書信中亦敘述臺灣是較易謀事的。張我軍，〈致含英函〉，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無論是去京或來台，謀生都不是容易的，因為這個年頭，文人，尤其有天良的文人，到處倒霉也。不過兩者擇其一，我是贊成來台的，因為台灣或者較易謀事。」頁472。

此，張我軍藉由職務之便得以重新認識睽違已久的故鄉，留下一系列關於臺灣風土的人文紀錄，並能暫時擺脫戰後臺灣社會與政治的苦悶。

2、鄉愁與現實：返臺後的社會實業觀察

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產生具移動性的獨特流動空間，諸如直接橫越於地景的鐵路、道路、航線等，此類空間不僅促成人群的大量移動與習慣，也成為旅者的特有空間。⁵⁵東北或華北的臺人大多集中至華北，轉由上海搭乘輪船運返臺灣，於下船港口登記換發乘車證返鄉。⁵⁶目前雖未能得見1946年張我軍返臺船旅的親自記述，但任職茶葉商業同業公會、合作金庫研究室專員後，讓作家有機會利用公務一訪臺灣各地，走入他所謂「未知的世界」：

千想不到萬想不到，在北平過了半輩子紙墨和粉筆生涯的我，回到光復了的臺灣來，竟會為了餬口之計走進素昧平生的茶葉界做事。這事的幸與不幸，我自己也不敢說定，但從這一天起總算是出了象牙之塔，走到未知的世界了。經過一年多的摸索，居然也發見了不少大可隨寓而安的材料。尤其是有時還可投入大自然的懷抱，越山過嶺去看看茶山，看看摘茶風景，飽聽那許多男男女女唱和著的山歌，借以忘掉塵世的俗慮，這是以往所沒有的經驗，大可以自慰的。⁵⁷

在北京文化界風光一時的張我軍，返臺後雖於文章與書信中感嘆自身的不得志，為了生計任職全然陌生的茶商公會，卻也感懷這工作提供他許多超越以往的生活經驗，更可以讓他拋卻世間煩惱，以新視野療癒自我。

〈在台島西北角看採茶比賽後記〉中張我軍以「記者」自稱，表述此行附帶目的是「想看看別了將近四十年的小基隆，希望在那裡喚起一些兒時的回憶」（〈在台島西北角看採茶比賽後記〉，頁316）。對比

⁵⁵ 蒂姆·克雷西韋爾（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76。

⁵⁶ 何鳳嬌，〈戰後接運旅外台胞返籍初探〉，頁184-187。

⁵⁷ 張我軍，〈關西鎮上看摘茶〉，頁18。

採茶賽會的篇幅，作為《臺灣茶葉》記者的張我軍也敘述不少個人記憶和旅運過程，尤其淡水到橫山的卡車路途上所見地景的變化讓人驚訝時勢的推移。離散經驗為另一種形式的流放經驗，對離鄉二十多年的張我軍而言，臺灣的時間、記憶、過去是凝滯的，而返臺後的新舊生活經驗交互組織他對家鄉的認知。⁵⁸外祖父家的確切方位雖已遺忘，八歲時探視親人的記憶卻藉由視覺、嗅覺浮現，林投樹夾雜海水的氣味令作家難忘。後半篇幅張我軍不改犀利眼光，鑑於一九五〇年代臺茶外銷發展立場，省思採茶方式趨向量產逐利的錯誤，提出經濟力、教化力的改善辦法。〈埔里之行〉稱揚埔里郭少三推動臺茶「一心二葉」採摘法與製茶研究，也是基於上述的茶產思考。

張我軍散文抒情、寫景、論理兼具，並以一定篇幅敘述汽車、火車、臺車乘運的過程和風光，儼然存有以「車窗」觀看的視角，而他本人也有明確意識：「在火車上，我是不看書，有同行人我也不愛談話，我只愛把兩隻眼盯在車窗外。」（〈關西鎮上看摘茶〉）；⁵⁹「在車中的時間是八小時五十分鐘，這段時間我幾乎全部遊目騁懷於車窗外。……書，在家裡隨時可以看，外邊的風物景色則非在旅行中見不到。」（〈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頁330）除放眼窗外景物，也利用車程回顧旅程。張我軍動態視覺的掠視經驗，留下瞬即而逝的當下畫面及記憶回溯的懷舊色彩，從臺北至埔里考察茶山的〈埔里之行〉即記「駕過霧峰、萬斗六、草屯這些許多老友住著的舊遊之地。但是不遑下車一一訪問，只好從車窗望望他們的山居，默示了懷念之意。」（〈埔里之行〉，頁320）由地名研判應指霧峰林家、莊垂勝、張深切等故人。車窗外風光屬流動性即景，觀看者本身搭乘載具而不動，風景在交通工具移動的過

⁵⁸ 在離散的文化政治中，文化、歷史、傳統、身分不再是封閉系統，會受到記憶、幻想、欲望等錯綜複雜的中介及變造，而重新自我複製。李有成，〈離散詩學〉，《離散》（臺北：允晨文化，2013），頁62-63。

⁵⁹ 張我軍，〈關西鎮上看摘茶〉，頁19。

程，被車窗窗框切分為零散畫面。張我軍就透過各個畫面重新組構他睽違的家鄉，無論美醜：

車到埔里時，遠遠看見幾座山露出一條一條的肌肉似的赭土，彷彿像是巨人的淚痕。全山的樹木被砍伐淨盡，只剩些雜草，大雨一沖，處處山崩土裂便露出肌肉而構成了巨人的淚痕。人們這樣亂砍樹木，終於把身上所披的大衣被人剝掉的山大約也會流眼淚的。（〈埔里之行〉，頁321）

移動助於張我軍參與故鄉空間的想像，山巒山峰的沿途景觀就作家看來並非美景，盡是人為的破壞介入，諸如像人頭上癩瘡疤的香蕉林、如巨人淚痕般砍伐殆盡的崩裂山坡、被自然圍繞的市街入口卻由士兵看守的突兀感等。作家以生動的比喻形容故土的頹圯，具有強烈主觀印象的寫作視角。移動經驗中，張我軍深刻體會到時空的流動，對於瞬間且片段時空的記憶，昇華為凝視後的文字畫面：「仍循舊路搭了長途汽車，再鑽一次萬重山回到臺中」（〈埔里之行〉，頁325），來時車行近三小時的山路轉化為深刻記憶，「鑽」一字動態化的描繪山巒間的車旅。

1951年12月張我軍以鐵道、公路旅行的方式，一週走訪中南部各地十三個市鎮信用合作社。自詡「平生嗜好遊歷，尤其喜歡匹馬單槍閒遊他鄉異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頁329）的張我軍，感受各地風土民情後寫下〈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1952）為巡禮紀錄。旅途中張我軍深入各鄉鎮市集或街道，藉此觀察人口、土產、生活水平及民情風俗：高雄市街遼闊、百廢待興而頗富前景，臺南文化底蘊深厚、具別緻風味，在安平港首次見到的魚塭尤令張我軍感到興趣；然而隨產業發展與戰爭影響，嘉義、鹿港、蕭條市街蕭條。最後一站臺中相較於其他城市是張我軍最熟悉的，返臺後他曾住過近一年，積極與地方文化人士接觸，正面描述市街建設具規劃，又具現代物質文明。

由張我軍的散文不僅能初探戰後臺灣部分城市的景況，以及作家自我境遇之感嘆。其公務旅程雜記中更對張文環等臺籍作家創作語言斷裂而中止書寫，以及承受隨之而來的生活壓力之苦悶煎熬，深表同情：

我一邊和文環君且走且談，一邊斷斷續續地想著文環君的事。在臺灣光復以前，他是臺灣的中堅作家，做一個文學家正要步入成熟的境地。就在這當兒，臺灣光復了。臺灣光復在民族感情熾烈的他自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一件快心事，然而他的作家生涯卻從此擱淺了！一向用日文寫慣了作品的他，驀然如斷臂將軍，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將創作之比束之高閣。光復以來雖認真學習國文，但是一支創作之筆的煉成談何容易？況且年紀也不清了，還有數口之家賴他謀生理。目前他的國文創作之筆已煉到什麼程度我不大清楚，但是他這幾年來所受生活的重壓和為停止創作的內心苦悶我則知之甚詳。（〈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頁338）

另〈埔里之行〉能高區署的建築也牽引作家對曾遷居埔里的張文環之懷念，表現一種記憶安置的實踐，以及臺灣文化界自日治至戰後網絡的延續。張我軍對戰後臺灣文壇作家困境的描述，表現國語文的使用是戰後臺灣作家持續創作和維持生活的關鍵。⁶⁰日治時期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面對戰後臺灣，雖獲得民族情感上的滿足，卻在國民政府強調民族意識、去除奴化思想的文化政策下，面臨戰後日語禁制的一連串打擊。語言的禁制成了戰後臺灣社會鮮明的文化景觀，更影響其他文化領域的發展。⁶¹

作家的戰後臺灣印象，另見張我軍予林海音的書信〈致含英函〉（1948.11.2）描述戰後物價飆漲、用人重視經歷的社會狀況，以及六合

⁶⁰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頁261。

⁶¹ 張我軍認為戰後臺灣的語言限制連帶影響了美術環境的發展，本省人尚無法書寫中文評論，外省人則尚未融入環境鮮少給予評論。參見張我軍，〈從第四屆全省美展說起〉，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補遺）》：「他們深深感到沒有文字的幫助是無法完成美育的使命的。……本省向來就缺少美術批評家，而自光復以來，為了由日文變為國文的關係，這本已不多的批評家幾乎全部失掉了武器——用國文發表意見，在他們暫時是一件困難的事。至於省外來的批評家，大約是還不能融化在本省的美術環境中，所以很少用文字和本省作家相呼應的。……缺少批評家的臺灣美術界，不但作家感到寂寞難堪，凡是關心美術的人，也都難免感到一種寂寞的哀愁。」頁28-29。

書店資本不繼已告結束的諸多頓挫。戰後生活的不順遂令張我軍感慨：「無論是去京或來台，謀生都不是容易的，因為這個年頭，文人，尤其有天良的文人，到處倒霉也。」（〈致含英函〉，頁472）信中寫道臺灣茶商公會職務的收入不敷一家使用，但是「這裡很自由，生活頗似隱者，用不著與人敷衍」。（〈致含英函〉，頁472）如此感觸或許是對比前份工作的臺灣省教育會編纂組環境，「生活頗似隱者」一言或為歷經二二八事件後文人無用武之地的自我安慰。志業無處伸展且謀生不易的境遇下，作家輾轉進入臺灣茶商公會工作，1948年主編《臺灣茶葉》季刊，陸續發表〈採茶風景偶寫〉（1948.6.3）、〈喝茶在北方〉（1948.6.25）、〈山歌十首〉（1948.10.1）、〈在台島西北角看採茶比賽後記〉（1948.10.1）、〈埔里之行〉（1949），並於《台旅月刊》、《公論報》、《新生報》撰著〈關西鎮上看摘茶〉（1949.7）、〈四屆全省美展觀後感〉（1949.11）、〈從第四屆全省美展說起〉（1949.11.23）等散文雜記，皆具深刻的懷鄉情感與臺灣風土、文化觀察所得，夾雜他兒時回憶與北京描述。

〈採茶風景偶寫〉開篇即道離鄉二十年的經歷讓故鄉風物記憶愈見迷糊，但童年記憶卻趨明顯、美化，使人對故鄉心生憧憬：

在北平一住住了二十年的我，故鄉的風物在我的記憶中漸漸地迷糊下去了。然而童年時代的若干記憶反而一年比一年的明顯起來，或者可以說是美化擴大得全非本來面目了。那些經過美化擴大的童年時代的記憶，往往突如其來地使我憧憬故鄉，使我萌起一種酸中帶甜的鄉愁。（〈採茶風景偶寫〉，頁312）

作家所言的採茶風景是三十年前僅見一次的記憶，離鄉的距離及思念令作家愈加憧憬臺灣，只能倚靠童年記憶勾連逐漸模糊的故鄉風物。童年記憶不是固著於經驗的那時，而是在張我軍成年之後且童年時光完全過去的後來時刻才被引發，鄉愁以懷舊或記憶的方式重新出現在作家的想像文字；回臺後所見物景的堆疊，亦是另一呼喚鄉愁的方式：「沿途遠遠近近隨風招搖的許多相思樹，不但使我特別感到新鮮，並且叫醒了

少年時代的回憶，勾起了我二十年來的鄉愁！」⁶²南國特有的相思樹是張我軍念茲在茲的故鄉風物，總能讓他憶起青春年少的悸動，一解鄉愁。

張我軍對臺灣採茶風景的嚮往根源自鄉愁，他運用對比修辭記述童年令人嚮往的牧歌式茶園生活，戰後乘著職務之便赴臺北海山茶園一探究竟。此次採茶風景的實地參觀，呈現臺灣現實與原有風物想像的落差：機械文明的進駐、採茶場面的勞動實景消泯了作家的鄉愁與浪漫想像：「製茶的機械化，把採茶的情調俗化，把茶山的神秘羅曼絲驅進深山去了！」（〈採茶風景偶寫〉，頁315）記憶想像破滅的當下，現實存在的只有茶廠內不斷運作、咆哮的茶葉揉捻機，機械運轉的轟隆聲響益加襯托出作家內心的惆悵。除了實際的空間距離，時間上1926年6月復歸北京的張我軍至1946年才又回到臺灣，二十年間的臺灣茶葉產業狀況在官方政策介入下已全然不同，⁶³這是張我軍始料未及的變化，也凸顯返鄉後作家與故鄉現實的疏離與情感失落。這心理距離同見於公務考察的他篇記述，作家面對不熟悉的中南部，行前穿著過多而不堪溫度變化的驚訝敘述：「車行僅四小時，同是一個小島上，氣候竟相差如此之多。」（〈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頁330）；另外，〈採茶風景偶寫〉的同行者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包括茶商公會理事長兼畫家陳清汾、理事王水柳、新生報記者王振濤等人，因故未能成行者原有李石樵、楊三郎、郭雪湖。1934年陳清汾與畫壇友人共創「臺陽美術協會」，戰時轉至平滬一帶活動，戰後投入茶葉產銷。⁶⁴臺陽美術協會的藝術運動

⁶² 張我軍，〈關西鎮上看摘茶〉，頁20。

⁶³ 臺灣總督府當局為加強對製茶工場的管理和茶業的控制，於1940年頒布「茶製造業取締規則」，規定只有申請許可的製茶工場才能從事製茶，臺灣茶葉開始仰賴專業製茶廠的加工製造。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臺茶外銷興盛，臺灣省政府為加強茶業的發展與管理，1950年頒布「臺灣省製茶業管理規則」，並改善製茶技術與設備，以提高臺灣茶業的品質。參見潘美玲，〈北埔與峨眉茶產體制之比較〉，《客家研究》第六卷第1期（2013.6），頁73-88。

⁶⁴ 王水柳（1898-1992）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王添灯的兄長，為二二八相關史料的重要見證人。王水柳的三弟王進益留日歸臺後1930年與朋友合辦《伍人報》批評時政，家人擔心他參與社運惹出禍端，於是讓他遷往滿洲國主

為臺灣民族主義在藝術領域的表現，故戰後張我軍的人際網絡除了茶葉商業同業公會的職務，也有連結日治以來文化團體的在地脈絡。

漂泊他鄉讓人面對文化移植或斷層的焦慮和危機感，故回歸、肯定鄉土是張我軍面臨生命轉變的自然選擇。⁶⁵這種肯定鄉土的歸返情感，讓甫回家園的張我軍對所有事物都莫名抱有好感：

回到了光復不久的故土一看，真是一草一木都覺得可愛可親！連他過去以為是極鄙俚的「歌仔戲」，聽起來也覺得新鮮有味，不過經過若干時日以後，他卻又覺得這確乎是不高明的了。……一位客家籍姑娘唱的山歌，那婉轉悠揚的聲調，使他飄然欲仙了。……那恐怕是從山鄉部落的大眾之間像泉水般湧出來的，唯其如此，那又是無掩無飾一絲不掛的真情的流露。（〈山歌十首〉，頁305）

南遊訪友的作家在臺中偶然聽到山歌而無法忘懷，委請北埔的姜瑞昌選集，細究歌詞後驚嘆山歌歌詞的隱喻巧妙與豐沛情感，並非一般士人所能闡述；然作家對歌仔戲感受的變化，另又顯現作家於文明開化與戰後鄉愁之價值拉鋸狀態。

此外，散文內容另呈現張我軍由日治臺灣及北京生活所持續的人脈網絡，包括埔里故友與海山茶園的同行旅伴，以及公差期間接受彰化縣議長賴維種的接待，張我軍敘述兩人同時在北京求學，為多年的老友。此站也是繼嘉義與張文環會面後，文字情緒表現最愉悅的段落；另一特色是作家行旅移動之際，慣以經驗記憶、當下感官參與臺灣地景空間的生產，而形成不得其所的錯置感。即張我軍評述臺灣市景的主觀性與情

持家業文山茶行的大連分行業務。陳美妃訪問，曾士榮、林玉茹紀錄，〈王水柳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4期（1993.2），頁127-130。張炎憲，〈序論〉，張炎憲主編，《王添灯紀念輯》（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5），頁10-15。陳清汾（1913-1987）生平參見臺灣大百科全書（文化部）：<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9697>。2020/3/10 作者讀取。

⁶⁵ 秦賢次，〈張我軍的漂泊與鄉土〉，頁14。

緒感受的疏離感之文字特質，一如前述埔里山巒癩瘡疤、巨人淚痕的轉化形容，以及掛念嘉義、彰化兩地故人之懷舊記述。

（二）原鄉變奏曲：島嶼上的北京殘影

戰後張我軍關於中國的描述可從兩類資料加以討論：一為前文所述之時論或國語教育論述，二為散文隨筆。除了對戰後國民政府政策的論述外，張我軍返臺後主要創作是在實業性雜誌所發表的遊記、散文，內容多寫臺灣風物卻不時穿插北京經驗，予以參照。寫作情緒包含對故鄉臺灣現狀的失望，以及北京舊時生活的回味，間接顯露作家對中國政府接管下戰後臺灣社會的不滿以及個人困頓：

我回到台灣以來不夠兩年，為了始終處在半失業的狀態，既未帶回金鈔之類，老家又沒有穀子可收，所以只好把自己對之有些感情的東西陸續「死別」淨盡了。……可是後來賣到太太心愛的東西，就難免躊躇一番了。結果雖然還是賣掉，但這種時候總不由得想起北平生活的二十餘年間，當舖的方便對我的恩惠。（〈當舖頌〉，頁302）

回到臺灣的張我軍處理經濟難題依照在北京生活的老方式——上當舖，揮別私人物品以換取金錢，由當前的臺灣生活對比舊有的北京經驗，評判兩者優劣。〈當舖頌〉（1947.11.23）寫於作家經營六合書店不順遂之際，文中也藉由當舖的印象與體驗，勾勒出北京生活的個人記憶，更以北京當舖的不成文規定襯托戰後個人境遇：

這是一般當舖的不文律，權力在他們手上，所以法律也只好由他們自定。而況開設當舖的也是人，所以一朝權在手也會專替自己著想而置他人的立場於不顧。好在贖回來的時候還是原來的足金戒指和整好的皮襖，並沒有依照明文執行；這一層比較一班遇到於他有利的時候必定依照明文執法如山的某一種人類，卻又天良多多了。（〈當舖頌〉，頁303-304）

引文看似批判北京當舖擅改典當物品狀況的陋習，但實則寄寓作家戰後活動受人阻礙的不如意。偌大的「北京」宛如被壓縮為一個「當舖」，在張我軍的敘事中作為行動地點或是被描述的對象存在，北京的當舖是不分階級，供窮人、商戶、旅人、有錢階級等客層使用，戰後臺灣卻相對缺乏這樣的嚴明體制，多以權力、人情取捨權衡。

回憶過往起因之一為企圖獲取安全感，再者為確認自身曾存在的印記與延續存在感。⁶⁶戰後回到臺灣的張我軍過得並不順遂、安定，其創作不禁流露出濃厚的懷舊情緒。⁶⁷他寫於1951年清明之夜未曾發表的〈春雷〉（1951.4），由氣溫、北風、冰雪、打雷、降雨等氣候特徵，對比北京、臺灣兩地生活的感知差異，將身體經驗的感官直接扣連情感感受與現實比喻：

到了青年時代，在許多青年從臺灣湧到日本去留學的潮流中，我獨自渡海而至大陸，遠遠地到北方去工讀了。生長在所謂「常夏」的臺灣人，一下子跑到冰天雪地的北方去生活，雖然正在體壯氣盛的時代，要熬過一年總有幾個月是在冰點下的氣候，確實是一件難堪的事。（〈春雷〉，頁326）

北京生活令作家憶起少時對春雷的盼望，甚而引出現實中對春雷的期盼象徵。春雷象徵希望，而等待春雷的焦躁另刻劃張我軍對戰後臺灣社會抑鬱氛圍及多雨潮濕氣候，所亟欲改革、轉變的心境。日治殖民環境迫使張我軍渡海至異鄉追求理想，承受寒冷氣候而度過青春時代：「我便是為了環境的關係，在愁眉苦臉中匆匆度過了一人只有一度的青春時代的！」（〈春雷〉，頁328）北京生活亦曾讓張我軍一度對春雷與希望的情感聯繫脫節，但臺灣多雨氣候造成的鬱悶卻又令人念起春雷的新生意義。文章最末段所言：「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曾經給我帶了希望來的春

⁶⁶ 董琦琦，〈城市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消解〉，《人文書寫與地緣景觀：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北京印象》（北京：學苑出版社，2016），頁220-225。

⁶⁷ 奚密，〈台灣人在北京——1949前在京台灣作家簡論〉，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79。

雷，現在又在苦雨已久的今天給我帶了晴天的無限希望來。」（〈春雷〉，頁328）童年時代春雷之後便有新生小蠶，青年時代北京春雷響起後便是擺脫嚴冬束縛的暖春來臨，以此比喻套至苦雨已久的今日臺灣，或許意指張我軍內心期待的社會變革，「晴天」實為理想的社會環境與制度。

戰後臺灣政治環境的緊縮以及文學發展的語言限制，讓張我軍感嘆文化的空白：「臺灣的藝術文學以至社會科學，由於發表工具的突變——由日文而國文，光復以來已成真空狀態，現在維持著臺灣文化藝術的門面的，只有這美術一部門了。」⁶⁸〈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亦藉張文環之例，呈現臺灣作家終戰後的文學困境；〈春雷〉則藉由期盼象徵社會改革的春雷響起，迂迴展露張我軍性格中銘刻的社會責任與政治意識。此寫作意識除緣於復返家園的個人感觸，還有1949年四六事件涉及其子張光直安危所使然。時讀建中的次子張光直因思想左傾於1949年4月入獄，至1950年3月方獲楊肇嘉力保釋放。張光正敘述因弟弟張光直於四六事件中被捕，以及戰時父親曾與八路軍身分的學生聯繫，致使張我軍返鄉後對時事政治三緘其口。⁶⁹《蕃薯人的故事》描述張我軍對張光直被捕後的反應，於萬分驚懼下將左傾書籍藏於茶商公會辦公室，以避查緝。遺憾的是，當1950年張光直獲保釋時，張光直祖母已逝世而無法見孫子一面，這對張氏父子無疑是一大打擊。⁷⁰完稿於清明的〈春雷〉以束縛和威壓形容嚴冬，張我軍敘述自己「防寒的衣具也逐漸整備，對抗有方了」（〈春雷〉，頁327），過慣北方生活嚴寒的威壓，這或許是戰時北京於日本勢力下生存的作家自況。張我軍也由北國冬日追憶起

⁶⁸ 張我軍，〈從第四屆全省美展說起〉，頁31。

⁶⁹ 張光正，〈悲、歡、離、聚話我家——一個臺灣人家庭的故事〉，《番薯藤繫兩岸情》（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頁24-25。張光直四六事件入獄經過，參見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8）。終戰後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成立北平市委，張我軍的學生甄華為其中一員，兩人曾在北京城外見面徹夜長談，有過短暫聯繫。海峽評論編輯部，〈世道興廢原有數 浮沉聚散亦何傷 張我軍留在大陸的長子何標自述（下）〉，《海峽評論》第352期（2020.4），頁66-67。

⁷⁰ 張光直因四六事件被捕經過與交保，參見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頁56-58、101。

春雷作為驅走嚴寒的期待，盼能一解家鄉的愁雲苦雨。此間筆意不難見出作家對四六事件的餘悸，只得將不平寄託昔日北京經驗，興發對臺灣政治環境與文化壓制的感懷與諱言。

尋找認同本是人類境況天性的一部分，國族國家便是結合了此種人類感受的地方情感與抽象性空間的產物。⁷¹「北京」在張我軍散文中猶如一個文字觸媒，將今昔的記憶及經驗對比、連結，以催化主體認同的建立。〈山歌十首〉開篇作家仍由故都北京生活敘述起，自言離開臺灣之初與再次返臺的內心情緒：「話說那一年老童生逃出了日本治下的老家臺灣，遠遠到了北方故都之地，住了二十有餘年之後，回到了光復不久的故土一看，真是一草一木都覺得可愛可親！」（〈山歌十首〉，頁305）引文以「逃出」形容日治時期離鄉一舉，且分別以「老家」、「故土」和「故都」形容臺灣與北京，認同意識表現出「家」、「土地」與「國」的層次區別。打造家園的活動實有作為抵抗形式的意義，可以塑造自身認同的相對自由。⁷²故戰後張我軍對於北京、臺灣兩地生活記憶的追溯與層次表現，實際隱藏了他一貫追求民族自由的現代性信仰。

散文〈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記載了1951年12月3日至13日代表合作金庫，到屏東、高雄、鹿港、彰化、臺中、基隆等十三個市鎮信用合作社的考察紀實。作家自述愛好遊歷他鄉異域，卻囿於環境而足跡多所受限。由文中可知這些環境條件，包括經濟因素（物價飲食）、政治氛圍（憲警旅館查店）與臺灣各地尚待修復的物質建設等。此篇詳繪了臺灣各地的自然風光、歷史變革和風土人情，字裡行間仍寄寓作家對北京風物的懷念，甚至以北京經驗為基準評判臺灣：

這些古跡名勝是和一、二百年的首府傳統相呼應，使台南市成為古香古色的。但是赤崁樓和延平郡王祠，除了叫我喚起一些歷史的憧憬以外，對於那些建築和室內陳列的古物，在看慣了北平的

⁷¹ 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158。

⁷² 同前註，頁45。

古跡名勝的我，說句得罪人的話，那實在是太渺小了。（〈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頁336）

公務之餘遊覽臺南名勝的張我軍，除了感到歷史憧憬，較之北京古蹟名勝只覺其渺小。作家透過個人記憶與歷史追述的前後參照，描寫東港、高雄港、鹿港等交通要點的物景興衰，呈現了五〇年代初臺灣歷經戰爭而百廢待興的社會景觀。

戰後張我軍的散文雜感一方面呈現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觀察，另一方面凸顯作家之於北京生活的懷念與價值判準。關於茶葉實業的背景討論亦映現作者北京的生活經驗，如〈喝茶在北方〉所述之中國平津一帶喝茶文化，包括茶房、茶室和打茶圍等規矩。⁷³作家藉由諸感官感受帶出生命記憶，將北京身影投映在文本中臺灣的空間記憶與生活情境，這種懷舊追憶情緒的流露與戰後不穩的時空環境息息相關。面對仍待建設修復的戰後臺灣現況，張我軍除了詠嘆臺灣風土，更選擇回溯個人童年記憶或北京經驗，行文卻又不時夾雜民族立場的自清，這種虛實相間的散文敘事呈現戰後甫返家鄉的作家，其對自我身分與社會位置認知的游離，而亟欲重構記憶與身分的心靈狀態。

張我軍的戰後散文呈示了個人身分（臺灣人）與土地記憶之間不得其所的認知疏離，因而他不斷回溯個人記憶、對比中國、臺灣兩地的經驗，企求尋回自己與臺灣家園的連結。段義孚討論「遷移」和「人地關係」的概念，提出人類奔逃移動的過程裡借助了語言文字之文化手段，再行精神創造的積極意義。⁷⁴而戰後的張我軍以車窗為框瀏覽、描繪臺灣物景的流轉，這不僅是空間移動下的文化實踐，亦顯影了經驗和知識投射的主體景觀，附著了作家對臺灣的獨特理解與空間創造。可以說與故土時空相隔二十年的張我軍，其臺灣圖景是在主體感官、語文運動的

⁷³ 張我軍，〈喝茶在北方〉，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補遺）》，頁56-57。原刊《臺灣茶葉》創刊號（1948.6.25）。

⁷⁴ 段義孚（Yi-Fu Tuan）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臺北：立緒文化，2006），頁12-13。

文化位置及北京經驗的對話中間接萌發形構的。在此認同路徑及感知歷程下，由中國返回臺灣的身心移動和其間所產生的認同流動及生命感懷，便為作家戰後書寫的基底意識。

四、結語：以北京為緯的臺灣鄉景

張我軍雖然沒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但一九二〇年代便跨界至中國工作、學習，深受五四文化運動的影響，其後更以北京為生涯重心，於戰時持續文化建設的實踐。城市向被認為是社會活動頻繁交流的地方，為具有顛覆性力量的會遇空間，此特點尤其彰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與1937年日本攻佔北京後的文化界狀態。身分是個變動不居的拆解與持續建構過程，無法免於歷史文化的介入。⁷⁵張我軍在中國生活的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間，千年文化與新世紀氣息交會的北京，於思想、社會、政權方面無不起了絕大變化，反封建、爭取民權的思想風行蔓延。戰時北京環境又讓張我軍以身為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身分，再次意識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官僚之於人民的脅迫與自我主體的危機；而中國社會、國民性與文化發展則讓他發現大眾對於壓迫根源的無知。這種反殖民、文化實踐與民族意識的多重交錯，加諸戰時北京情境與戰後個人被中國政府遺棄的失落情結，翻轉了前一階段張我軍認同的中國傾向，轉而回望臺灣故土訴諸歸屬感。

戰後臺灣人對新中國的願景並非一片光明，其制約在於中國本土的現實狀況與政府的對臺態度。⁷⁶站在1945年終戰座標上的臺灣知識分子，其書寫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線所影響，其一為曖昧的身分認同，其二為強烈的時代焦慮。尤其旅居中國的張我軍第一時間直接面對了政權轉

⁷⁵ 李有成，〈離散詩學〉，頁59。

⁷⁶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588。

移、文化差異的遽變，相應產生了國族認同的意識掙扎、反抗與適應。基於肩負戰後中國、臺灣兩地文化橋樑的責任，以及對國語文運動推動的心志，張我軍投入同鄉會而奔走華北臺人遣返事宜，對臺灣歸返中國後問題發表系列時論，其後更返臺助力文化事業。張我軍返鄉後急切的縫合自己與故園的距離，然而國民政府的治臺政策、臺灣社會氛圍及二十年光陰所造就的隔閡，令作家無法順利接軌故土，故其戰後文字流露對臺灣社會各層面的疏離未知，甚至延續戰前想像，而帶有主觀評判；北京經驗雖非張我軍戰後的書寫命題，其痕跡卻夾雜於連結離鄉已久的己身與故土臺灣之間的縫隙，以視、嗅、觸、味覺等感官知覺，或已有的知識和生活經驗顯像於文字。面對疏離的故土臺灣，張我軍運用久居多年的北京生活經驗予以對應，形成原鄉與遷移地的時空錯置。可謂作家對戰後臺灣圖景的建構與認知，相當程度乃構築於北京記憶之上，於此揭露了他與原鄉既熟悉又陌生的尷尬景況。

人類是需要連結與歸屬的物種，離散的對象可能是親友、國家故鄉，甚或是對自我的迷失，離散可謂近代臺灣人生命存在的一部分。張我軍戰後散文諸篇雖寫臺灣，卻概以北京提起敘事，展開對戰後臺灣在地民情的文字考察與歸屬連結，而寄寓對故土（臺灣）、故都（北京）的雙重鄉愁與社會省視。此寫作取向一則歸因於張我軍返臺後對社會文化現況的不滿，加諸個人發展不順、家庭變故、政治壓制所導致的茫然與失望，令其揀擇寫作題材，隱晦表現所感所見；一則為離散經驗的生命引力，持續喚引出作家居住地與遷移發生地之場域互動與拉鋸，致其傾向以過往北京記憶填補、塗抹歸臺後在地書寫的間隙；因此，張我軍戰後散文亦呈現尋鄉的移動性，此乃其長久離鄉經驗所驅使的寫作意識。作家選擇性繞行、越過臺灣現實，轉由北京為自己提供另一穩固的位置或連結的方式。其文字每一個移動隱喻所指涉的不單是邊緣性的感覺，也指涉了主體對自我敘說與安置的渴望。此新舊經驗交涉與自我身分重構的過程中，不得其所的張我軍顯然不得不暫將北京作為依託座標，藉此評判並建構臺灣生活與文化關懷，打造一個安身立命的新家園與前景。

主要徵引文獻

一、近人論著

(一) 張我軍著作

- 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
- 編，《張我軍全集（補遺）》。臺北：台海出版社，2016。
- 張光直編，《張我軍詩文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9。
- 秦賢次編，《張我軍評論集》。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
- 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 上》（社科卷）。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

(二) 專書及專書論文

- 《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1946.2.15-1946.5.1）。臺北：傳文文化復刻出版，1998。
- 王詩琅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北京：北京大學，2012。
-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 何標（張光正），《明月多應在故鄉》。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
- 李有成，《離散》。臺北：允晨文化，2013。
- 林海音，《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臺北：格林文化，2000。
- 林慶彰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在中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4。

-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 洪炎秋，《淺人淺言》。臺北：三民書局，1971。
- 張光正，《番薯藤繫兩岸情》。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8。
- 張炎憲主編，《王添灯紀念輯》。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5。
- 許俊雅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6張我軍》。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 彭小妍主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1996。
-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2、3）。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
- 陳雲林總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第102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7。
- 陳萬益編，《閑話與常談：洪炎秋文選》。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 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臺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7。
- 董琦琦，《人文書寫與地緣景觀：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北京印象》。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16。
- 鍾理和著，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卷5、6）。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

-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2。
- 【英】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臺北：立緒文化，2006。

（三）期刊論文

- 王文仁，〈新舊變革與文學典律——張我軍與胡適的文學革命行動〉，《東吳中文學報》第20期（2010.11），頁191-218。
- 王國安，〈「罵」出新典律——論張我軍與林耀德文學革新運動的話語操作及運作策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十一卷第3期（2017.9），頁54-72。
- 山口守，〈北京時期的張我軍：被文化與政治夾擊的主體性〉，《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0期（2017.2），頁56-105。
- 何鳳嬌，〈戰後接運旅外台胞返籍初探〉，《臺灣風物》五十卷第2期（2000.6），頁155-191。
- 海峽評論編輯部，〈世道興廢原有數 浮沉聚散亦何傷 張我軍留在大陸的長子何標自述（下）〉，《海峽評論》第352期（2020.4），頁66-69。
- 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一卷第1期（2008.4），頁33-84。
- 陳美妃訪問，曾士榮、林玉茹紀錄，〈王水柳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4期（1993.2），頁127-130。
- 黃乃江，〈張我軍的處女作及其在廈門之文學活動新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十二卷3期（2008.5），頁10-15。

-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12），頁223-270。
- 楊護源，〈終戰後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備準備（1945.08.15-10.31）〉，《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第37期（2014.12），頁1-16。
- 褚靜濤，〈臺灣光復後滯外臺灣同胞返臺的經過及其影響〉，《臺灣研究》第1期（2000.3），頁81-85。
- 劉恆興，〈兩端之間——論1920年代張我軍新舊文學意識與文化民族認同〉，《漢學研究》第二十七卷第2期（2009.6），頁333-364。
- 潘美玲，〈北埔與峨眉茶產體制之比較〉，《客家研究》第六卷第1期（2013.6），頁69-108。
- 賴衍宏，〈張我軍與正岡子規〉，《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36期（2014.12），頁427-452。
- 鍾鐵民，〈北平的記憶〉，《鹽分地帶文學》第19期（2008.12），頁22-30。
- 羅詩雲，〈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淡江中文學報》第41期（2019.12），頁215-242。

二、網路資源

- 陳清汾（1913-1987），臺灣大百科全書（文化部）：<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9697>。2020/3/10作者讀取。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Kwang-Cheng, ed., *Chang, Wo-Chun Chuanchi(supplement)*. Taipei: Taihai Publishing House. 2016.
- Chang, Kwang-Cheng, ed., *Chang, Wo-Chun Chuanchi*. Taipei: RenJian Publishers. 2002.
- Chang, Kwang-Chih, ed., *Chang, Wo-Chun Collected Works*. Taipei: Belles-Lettr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Chen, Ping-Yuan, Wang, Te-Wei, ed., *Beijing: Urban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su, Chun-Ya, ed., *Taiwan Hsientangtai Tsochia Yenchiu Tzuliao Huipien16 Chang, Wo-Chun*.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2012.
- Hsu, Hsueh-Chi, "Taiwanese in Beijing from 1937 to 1947,"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 2008.4, pp. 33-84.
- Huang, Ying-Che, *Chu Jihpenhua Tsai Chungkuohua: Chanhou Taiwan Wenhua Chungchien(1945-1947)*.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7.
- Peng, Hsiao-Yen, ed., *Piaobo yu Xiangtu: Chang, Wo-Chun Shishi Sishi Zhounian Jinian Lunwenji(Diaspora and Homeland: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ang WoChun's Demise)*. Taipei: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1996.
- Tim Cresswell, Wang Chih-Hung, Hsu, Tai-Ling, trans.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New Taipei City: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2006.
- Yamaguchi Mamoru, "Chang Wo-chun in Peking: Identity caught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20, 2017.2, pp. 56-105.

Return to the Island: the Returning Narrative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Beijing in Wo-Chun Chang's Literature after World War II

Shih-Yun Lo*

Abstract

In his life, Wo-chun Chang lived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During his lifetime, which spanned throug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post-war era, he had always been active in cultural activities. His writings represent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lonial youth and his observation about China. In 1945, he joined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ese Provincials in Beijing. In June 1946, he returned to Taiwan. His writing after the war primarily comprises political commentaries and essays. Whereas his political commentaries are discourses about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core of his creation is the travelogues and essays he published in business magazines. In these articles, he wrote about Taiwanese customs and objects,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well as his disappointment in Taiwan's status quo and his reflection on his old life in Beijing. Therefore, the postwar cultural activities of Chang serve as critical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wartime China, postwar Taiwan, and the situations of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returning to Taiwan from Mainland China.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topics and timing of his writing, all reflect the meaning and his observation of the life history of Taiwanese people before and after 1945. Regarding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is paper, it adop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ese Provincials in Beijing in 1945 as the central axis, and incorporated the daily life Chang portrayed, to represent the life of Chang in early postwar China. Subsequently, this thesis organized Chang's

*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observation of the societies of postwar Beijing and Taiwan, especially his sensual thinking on spatial movement and memory representation. Using postwar Chang as the scope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spirit and the narrative in identity before and after intellectuals from excolony returned to Taiwan.

Keywords: Wo-Chun Chang, Postwar Taiwan, Beijing, Diaspora, Movement